

中国革命史 专题讲稿

第五册

江西省 现代史学会
中共党史学会

中国革命史专题讲稿

中共江西现代史、党史学会编
全书五册计二百万字

工本费 15.00 元

印刷批准书 赣出字(1986)第002号
(内部使用)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目 录

-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全面发动 余伯流(1)
- “一月风暴”和二月抗争 余伯流(44)
- “九·一三”事件和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
错误的努力 余伯流(83)
-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所谓“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孙剑纯(139)
- 天安门事件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孙剑纯(178)
- 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戴向青(230)
- 新时期的开始和党的工作在
徘徊中前进 胡敬豪(277)
- 伟大的历史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胡敬豪(300)
- 十二大的历史地位和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 戴向青(343)
- 浅谈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几个问题 黄干周(385)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全面发动

余伯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悲剧。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这是我们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在这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写好了《决议》，使我们研究当代史方向明确，有所遵循。《决议》中关于“文革”的这部分，是胡乔木同志亲自起草、修改定稿的。从19条至24条，约六千六千字，高度概括了“文革”十年的历史，表述准确、凝练、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领会。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一九五七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和我国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分不开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文革”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历史。大家都是过来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深切和直接的了解。但作为党史教学、科研工作者，还必须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说明和具体的研究。

研究“文革”的历史，首先必须弄清的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全面发动的？这个问题弄清原委，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对症下药。

下面分两大部分进行讲述：

第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这场内乱的起因，决议是这样表述的：“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段话，言简意赅，概述了“文革”发生的起因。

决议这段话，归纳起来有三个要点：①思想理论上的失误；②党的组织原则的破坏；③坏人的阴谋活动。讲了这三层意思后，最后一句结论：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可见，“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各种政治思想因素和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现在根据这三条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错误的逐步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首先应该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并非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曾经作过正确的分析。其主要论点是：①三大改造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同旧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

突，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加以调节和解决；③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理论要点是非常正确的，创造性的，是对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这些理论的提出，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为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指出了方向。

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能够坚持这些正确的观点，我们党也没有始终抓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作文章。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逐步离开了自己的观点，由正确转向错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第258页）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集中地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越发展越严重。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升级：

第一阶段：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的论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是：

1. 提出了“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和“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这个命题和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错误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最早提出了“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他的原话是：“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

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选五卷》第461页）这个论断是从反右派斗争中引导出来的。从理论上说，从实践上看，这个论断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政治战线上的革命”的概念，通常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还要进行一次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那究竟要推翻那个阶级呢？问题就出在这里。本来，一九五七年三月以前，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反右以后，他又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正确观点，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观点就成了他后来关于阶级斗争的“左”倾观点的基础。

与此相关的，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武昌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毛泽东同志在此提出了一个新的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用“政治思想”来划分阶级。这个观点，离开了经济地位，离开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离开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主张从政治思想上划阶级，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2. 推翻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是正确的。八大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

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却很快改变了“八大”对主要矛盾的看法，认为“八大”的决议不对，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选五卷》，第475页）。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基本被消灭了。而毛泽东同志重新说资产阶级还存在，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些观点明显地背离和推翻了“八大”的正确结论。这个关系全局的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失误。

3. 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写进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报告是少奇同志作的，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加上去的。哪两个剥削阶级呢？“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对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划归“剥削阶级”，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政治思想，用政治思想的好坏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此，毛泽东同志根据世界观的表现，认为我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占总数的80—90%）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种观点显然是知识分子横遭厄运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

要原因。全国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是不是剥削阶级，是不是敌人、反革命，历史已经作了回答，97%属于错划。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第二阶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有了新的发展，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向党内。这是第一次升级。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期，叫做神仙会，各种意见都可以提，纠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庐山会议前柯庆施是与毛主席一起上庐山的。王任重问柯庆施，你与毛主席一起上山，毛主席说了什么没有？柯回答，毛主席说：“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讲到陈云管经济工作管得好，一九五八年陈云没有管经济了，毛主席赞赏陈云同志是搞经济工作的内行。彭德怀上山后，七月十四日向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接到彭德怀信后，认为彭是“下战书”。“向党进攻”，因此决定批彭。会议从七月十六日开始转向，由批“左”转为批右。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当时刘澜涛的两个秘书编了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批发了这个文件，题名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其中有一段话：“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同志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路人”，是“昔日的功臣，今日的祸首”。这样，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伸到党内，搞了一场所谓“反右倾”斗争。这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

第三阶段：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十中全会把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扩大化、绝对化，并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这是第二次升级。

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量，认为国内外有八股逆流，国外的帝、修、反，国内的地、富、反、坏、右等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科学分析，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断定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也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着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因而尖锐地提出“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并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要求对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才能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些论断，较之他过去的错误提法又是一次很大的升级。它的错误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在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比如：邓子恢因为在这一年的春天，针对农业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提出了实行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正确主张，被批判为刮“黑暗风”、“单干风”。毛泽东指责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彭德怀因为在六月份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长篇申诉信（即“八万言书”），说明“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均属强

加于他的罪名，而被说成是搞“翻案风”，再次受到批判。毛泽东同志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会议还揭发和批判了所谓利用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活动”，这纯粹是康生捏造的一起冤案。十中全会上，康生用铅笔写了个条子送给毛泽东同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文化大革命”中，此话就成了毛泽东同志的语录名言，实际上是康生讲的，毛泽东同志念了一下。十中全会后就对为小说《刘志丹》提过修改意见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等同志进行立案审查，株连甚广。这些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表现。此案直到一九七四年，刘志丹的爱人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刘景范已在监狱关了八年，还没搞清楚。刘景范的问题，可以不可以挂事不挂人。毛泽东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宜再拖，建议释放，免于追究”。

第四阶段：一九六五年以后，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更加系统化和完备化，“左”倾错误急剧发展，斗争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核心。这是第三次升级。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制定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的“走资派”的政治术语。这个概念的提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就把党内那些有某些缺点错误的基层干部，以及那些对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有意见的各级领导人，看成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党内既然形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走资派”下边有，上边也有，地方有，中央也有，党

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这样，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干部，尤其指向党中央的干部是理所当然的了。

随着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毛泽东同志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正常。毛泽东对刘少奇早有意见。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不同意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提法。从这时起，毛泽东同志觉得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斯诺谈话纪要）。毛泽东同志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其他同志也感到不满甚至愤慨。他认为这些同志官做大了，有个人既得利益要保护，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毛泽东给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政治思想上变修了，所以不执行他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如果不抓党内的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时，在毛泽东同志的头脑里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中央要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顶住修正主义。（《党史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同年九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告诫全党：“中央的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个错误观点的形成，使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发展升级到“中央要出修正主义”的顶点，视线转向中央最高领导层了。

一九六六年以后，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和完备化。表现在：认为农村有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那里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工厂、企业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艺界大多数是裴多菲俱

乐部，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党政军中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露阴暗面，把党内斗争公诸群众，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等等。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点，后来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一文中集中反映出来，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概括了六个理论要点：（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把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该文在论列了这六个理论要点以后，狂热地吹嘘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

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并且还指出：“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试金石。”“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这篇文章是北航红卫兵起草，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定稿，送毛主席审阅认可的。陈、姚在送审的信上说：“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毛主席在信封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这就是说，这个理论的概括和这个理论的名称是得到毛泽东同志审阅同意的。从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的总概括。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持续。”

二、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恶性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上述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理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被党的会议所接受，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集体领导流于形式，形成了毛泽东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一切的局面，多数人失去了通过组织手段抑制错误发展的能力，因

而未能纠正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性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决议》第18条讲了三层意思：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下面，依次具体阐述这三层意思。

1. 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文选》第290页）可见，一九五七年以前党的生活是正常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就不正常了。也就是说，党内生活不正常是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开始的，毛泽东同志个人专断的作风也是从此逐渐形成的。

一九五六年，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又出现了冒进现象。主要表现在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三十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十五亿元以上；工资多开支六、七亿元；农贷和其他贷款多支出了五亿多元。由于财政上有了赤字，这就造成了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人民需要的许多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讨论，责成中宣部写一篇社论，即：《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根据社论精神，各地着重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当时实际工作中确实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提出反冒进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的。但是，这件事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多次批评和指责。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一股风，反掉了农业纲要四十条，反掉了多快好省，是对五六年工作的否定。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严厉批评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以后不许再提反冒进。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等等。由于毛泽东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厉批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责难，还不得不作了检讨。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后，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很大的损害。这时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反对。

一九五八年以后，党内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事例就较多了。例如：号召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事先并未经过党中央认真讨论；庐山会议上以个人权威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关于“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中央最高层领导意见不一致，但被写进《二十三条》强行通过；支持江青、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给《五一六通知》加上一系列错误论断；主张设中央文革，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炮打刘少奇，选林彪做接班人等等，都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意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人专断的产物。如果党内生活是正常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健全

的。重大决策真正由党中央集体充分酝酿，投票表决，一人一票，包括中央主席在内，那么，林彪、江青、康生之流不可能那样重用专权、飞扬跋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也就难以通过，“文化大革命”也就难以发动并持续十年之久。实际上，在发动“文革”之前，毛泽东同志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局面已经形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已经受到削弱以至破坏。毛泽东同志一般都不出席政治局会议，但政治局开会讨论后要向毛主席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同志与政治局常委之间已经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上下的关系了，毛泽东同志成了政治局的上级，他的话谁也不能持反对意见。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我搞文化大革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左”倾错误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当然也就无法纠正。

2. 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并恶性膨胀

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文革”前和“文革”中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是“文革”发动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

我们党历来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从遵义会议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一直到党的“八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十分注意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比如：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党校讨论什么叫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烈士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我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我也会犯错误。一九四八年八月，吴老（玉章）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讲话时，想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毛泽东同志回电说：“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没有什么